

中国农业的发展

(1368—1968年)

〔美〕德·希·珀金斯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中国农业的发展

(1368—1968 年)

〔美〕德怀特·希尔德·珀金斯著

宋海文等译

伍丹戈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

Dwight H. Perkin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本书据爱丁堡大学出版社 1969 年版译出

中国农业的发展

(1368—1968年)

(美)德·希·珀金斯 著
宋海文等译 伍丹戈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125 字数 363,000
1984 年 9 月第 1 版 198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600 册

书号：4188·33 定价：2.20 元

译者的话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一书，是美国学者德怀特·希·珀金斯1969年发表的著作。作者珀金斯教授，过去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现在是哈佛大学国际开发研究所所长。除本书外，作者过去还写过一些有关中国经济的著作，我所知道的，就有1966年的《共产党中国的市场管理和计划》，1967年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革命》等两种。可以说，他是一个对中国经济作过专门研究的学者。对于现在这个题目，除珀金斯外，帮助进行研究的还有王业键、肖王国瓈和苏永明等人。王业键教授也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有成就的华裔学者。他和珀金斯都曾访问过我国，王业键教授我曾会晤过，珀金斯教授却只通过一次信。对于作者，我所了解的就只有这些。

在这里，我就事论事说明一下我对于本书的认识以及我所以要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原因。据作者的自述，他写这本书的动机是因为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对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的农业至少弄清楚一个大概的发展轮廓；这是因为过去的中国经济难得有不同农业部门发生直接联系的，甚至本身就属于农业部门范围之内。这就是说，研究中国经济史，必须从农业着手，农业是中国经济的基础。那么，作者又是怎样进行中国农业的历史研究呢？

作者研究中国农业史的起点是：中国的耕地面积现在只

占全球耕地的百分之七，却养活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国的播种面积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七十，但它却要供养比美国多三四倍的人口。中国人民固然吃得不够好，但是总归生存下来并且在过去六百年中还增长了好多倍。这种状态是怎么样造成的？中国的农业发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这些确实是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从这一方面来看，作者研究中国农业的发展还是立足于现在的。

因为这样，在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上就必须研究或解答以下一系列的问题。第一，中国的农业从过去到现在究竟养活了多少人口，人口的增长率如何？第二，为了要供应庞大的人口，农产品产量势必有相应的增长，中国农业产量究竟是怎样提高的？是依靠耕地面积的增加，还是依靠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第三，因为要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知道中国传统耕作方式的特色是什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又起了哪些变化？诸如农具、肥料、水利、种子、作物种类以及播种技术等等，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和改进？在生产的发展上又起了多大的作用？第四，商品交换和农村贸易，城市和工业的兴起，租佃关系和土地制度等等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又起了些什么作用？第五，最后，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组织对于农业的作用又是如何？总之一句话，中国人口现在既然这么多，那么，用传统的中国农业生产方法加以改进能否解决问题？中国的农业发展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作者在这一方面虽然没有明白作出答案，但确实是向人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珀金斯这本书主要就是环绕以上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当然，内容也不限于这些，还涉及到其他方面。

为什么要将这本书翻译出来并将它介绍给中国读者？首

先一个原因就是每一个国家的人民总是关心他的本国的事情和本国的历史，中国人自然也不例外。我们不但欢迎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增进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而且愿意听到外国学者的见解，吸收他们研究的成果和学习他们研究工作的长处。但是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品种很多，为什么单单挑选这一本？这也正如作者所说，农业一向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部门，将它研究清楚，也就抓住了中国经济的关键。而且，国内对于农业史的研究也正在进行之中，正希望集思广益，取得更大更好的效果。不过这两点，还只是翻译这一部书的一般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它本身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值得我们借鉴。

国外研究中国农业史的著作也并不限于这一种，但它毕竟是其中一部著名的重要著作。主要的一点是作者在这一方面搜集了相当广泛的资料，并且做了相当细致的分析和综合工作，因而它是一个研究报告，而不是任意将一些资料拼凑起来编写成功的若干篇文章。在这项研究上，作者不但提出了许多独特的、新颖的见解——这些见解虽然并不见得都是正确的，有一些，据我看，还显然是不妥当的，但不管怎样，它们总都值得我们研究和注意，尤其是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采取了一些创造性的办法，很有参考价值。这就是我要将它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主要原因。

在农业史研究上，过去几十年来历史学界常常只侧重于生产关系或土地制度方面，却忽视或放弃生产力方面的研究，有时候甚至忽视到了忘记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生产关系所起决定性的作用的程度。这其实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本书作者则注重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尽管他在这一方

面的研究还不深刻，但是他在这方面已取得的成果无疑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尤其是他的注意研究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历史发展的态度。

在研究方法上，珀金斯在本书中注意宏观的农业发展。他首先注意到全局，注意到全国各地的不同的农业发展和变化。其次，作者又很注意于宏观的统计的研究。珀金斯的研究工作的一个最明显的特色就是将计量经济的方法应用于农业史的研究。在全书三百六十余页中，正文占一半，附录和各项统计资料几乎也占一半，而且正文中所附的统计图表，也有相当地位。我觉得，本书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发表了大量的统计并且提供了若干数字上的估计。据我猜想，作者们在搜罗资料、鉴定真伪、分析数据、编制统计以及进行估算上所费的心血和精力也许大大超过于文字的编撰。虽然这些数字的可靠程度仍然是不确定的，但是他们的这种创造性的劳动仍然值得尊重。它们无疑可以作为研究者继续探索的凭借或重要的参考资料。

珀金斯在搜集和使用资料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在现在条件下研究这个题目需要收集的资料，以及在作者的客观和主观条件下可能获得并且利用的资料，好象都搜集起来了。特别是水利资料，作者不满足于原来冀朝鼎的计算，而是从地方志上重新摘录，汇总计算，这是要花费很多劳动的。这种详细占有资料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很可贵的。当然，严格要求的话，这还是不够的，过去已经有人在这一方面对这本书批评过。

以上这些就是珀金斯教授这本著作的意义和它的长处。当然，前面已经说过，作者有些观点我是不赞成的。例如，

他认为中国的土地租佃制度并没有显示阻碍或破坏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因此，他就得出了租佃制度对中国农业生产并没有什么坏影响的结论。显然这是和事实不符的。这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的。

最后，我谈谈翻译方面的情况。我在七十年代初期就看到这本书，但是当时的环境不容许我花很多时间阅读这类书籍。过了两年，书是看完了，我认为将这本书翻译过来是有意义的，于是我就同我的同事，一位一向研究农业经济的学者宋海文先生商量，提出翻译这本书的打算，他也完全赞成。后来我们又邀约了潘纪一、刘汉才、陈声雅、毛智汇、萧功秦等几位同志和朋友共同进行翻译工作。但是因为我们是在业余时间逐译的，在工作繁忙或其他事情要做的时候，总是先把这桩事情搁下，而且，本书中许多音译的汉文名字如果要回译成原文，往往无法着手，必须向熟悉这些名字的人们请教，于是，翻译的时间就拖得很长。我自己又因为在明史研究方面花的时间较多，也只是断断续续地做些校订工作，现在全书总算译校完毕了，虽则拖延了很长的时间。在译法和译笔上力求不失原意。为了做到这点，即使译得生硬或者有点洋气，也在所不惜。虽然如此，我们也决不敢说现在的译文就一点都不走样，因为我们的本领毕竟有限。倘若读者发现译文中有什么错误或其他毛病，那么，不论大小，都请告诉译者或出版者，这样，不但我们个人受益，而且，对于今后翻译事业的改进，也有好处。此外，还要在这里对王德昭、吴璇、吴应寿、吴杰诸先生在翻译上给予我们很多帮助谨致谢意。

伍丹戈 1982.2.28.

前　　言

本书为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成果。研究会为了鼓励对中国现代经济情况作学术分析，因此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之下设置了这个委员会。虽说这个委员会所要探讨的主要是近二十年的发展，然而也间或对于较早时期的研究加以支持，只要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当前动向的理解。对这个重要的农业部门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珀金斯教授的广阔研究视野所取得的效果是同中国共产党人现在所面临的努力提高产量以便迅速适应增长着的人口的问题直接有关的。

这个委员会希望能够保证所出版的一系列著作是客观的和准确的。可是，归根结底，对于已完成的著作的全部荣誉和应负的责任，都应属于作者。

研究理事 沃尔特·盖伦森

作 者 序

三年之前，在西蒙·库斯内兹教授的鼓励之下，我带着想写一部全面的中国经济史的心情而着手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不久，我就了解到，当时还没有人用经济学观点对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农业发展作系统分析并用英语写出著作。既然在1900年之前，中国经济难得有同农业部门不发生直接联系的，甚至本身就是属于农业部门范围之内的，那么，在进行比较全面研究之前，至少有设法弄清农业发展的大体轮廓的必要。

本书就是这种意图的产物。虽然其中的分析，无论正确与否，都应由我负责，但这项研究工作，倘若没有一些人不断地给与帮助，我是承担不起来的。王业键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经济史家，他对这个计划的进行以及在整个过程中提供的指导和关键性的参考资料，给了我极为宝贵的帮助。就算我对中国古代汉语的知识事实上要好得多，但要从成千上万部地方志中找出1900年前的资料，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这项工作却由肖王国璎女士和苏永明小姐出色地替我完成了。

其他在研究工作的这个或那个方面给予帮助的还有李露西、托马斯·克什纳和托马斯·威恩斯。格洛里亚·格里格校阅了原稿最后两稿中大部分的打印本和复印本。

我同样很感荣幸的是有不少人欣然阅读本书的原稿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库斯内兹教授阅读了全书各章节的初

稿。全汉升、罗伯特·F·德恩伯格、罗伯特·哈特韦尔和拉蒙·迈尔斯诸教授每人都作了长篇评论，每一篇评论几乎都是一篇论文。另外还有许多人阅读过本书的若干部分，但我特别要指出的是费正清、利奥·奥林斯、伊夫林·萨喀基塔·罗斯基、亨利·罗素夫斯基和萨波拉默宁·斯瓦梅等教授提出的建议。

最后，在这三年当中，我从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经济委员会得到了充分的经济资助。

德·希·珀金斯

简称和计量单位对照表

简 称

《中农》 李文治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卷1（1840—1911年）；卷2（1912—1927年）；卷3（1927—1937年）。

《联服》 研究服务联合出版社（翻译服务组织）。

《农统表》 《农商统计表》，1914、1915、1917和1918年。

《十年》 国家统计局编：《伟大的十年》（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年版）

计 量 单 位

衡 量

1 斤 = 1.1 磅

2 斤 = 1 公斤

100 斤 = 1 担

20 担 = 1 公吨

2000 斤 = 1 公吨

面 积

1 亩 = 0.1647 英亩*

6 亩 = 1 英亩（近似值）

15 亩 = 1 公顷

容 量

1 石 = 100 升^a

10 斗 = 1 石

10 升 = 1 斗

币 值

1000 钱 = 1 两 (近似值)

1 两 = 1.5 元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近似值)

1 元 (1933) = 0.26 美元 (1933 年美元)

1 元 (1952) = 0.427 美元 (1952 年美元)

a. 现代化以前时期的相等数，参看表附 7-1。

目 录

前言	1
作者序	1
简称和计量单位对照表	1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六个世纪来粮食生产的增长	11
第三章 改良种子、改变耕作方式和新作物	45
第四章 农具、水利与肥料	67
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数理补充材料	102
第五章 土地的分配和租佃的作用	110
第六章 农村贸易及其对于农产品的影响	145
第七章 城市化、饥荒和粮食市场	185
第八章 中央政府和传统经济	219
第九章 结论	238
附录 1 中国人口资料	251
附录 2 耕地面积资料	289
附录 3 作物面积资料(1914—1957 年)	326
附录 4 作物单产量和产量资料(1914—1957 年)	356
附录 5 城市人口统计(1900—1958 年)	386
附录 6 粮食消费资料	396
附录 7 1900 年前的农作物单产量资料	412
附录 8 水利资料	451
附录 9 省际贸易的规模	470
参考资料目录	500

第一章 导　　言

目前中国的农业在全球百分之七的耕地上养活了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的播种面积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七十，但必须供养比美国多三、四倍的人口。

用二十世纪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人民是吃得不好的。但事实是，他们在过去六个世纪中生存了下来并且使人 口增长了好几倍。中国农民的干劲为世界的伟大文明奠定基础作出了贡献。今天，奠基者的后人正在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积累。

二十世纪以前，实际上整个中国经济全部都是农业部门。其他部门不是为农业部门服务，就是从它那里取得原料。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中国的工业主要是一些棉花、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加工工业。商业主要是食品和衣着的分配。只有很小的矿业部门、政府服务部门，也许还有建筑业，才是不依赖农业原料的（工作人员所需的食物除外）。

本书就是试图解释中国的农业经济如何在应付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之下仍能为富人、文艺及工业化提供小量的剩余农产品。当时是否总是有新的土地可以开发和耕种？或者中国农民是否只能在原有土地上设法提高产量？如果产量增加，那又是怎样增加的？新的办法是来自国外，还是出之于官员的学识和聪慧的农民大众的创见？在过去六个世纪中，是否确实有过很多农业上的新方法？

本书所涉及的时期始于十四世纪后期，终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什么要开始于十四世纪，又为什么要涉及如此长的一段时间？

公元 1368 年是明朝开国的年代。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将近两个世纪以来主要由于蒙古人的兴衰而带来的剧烈破坏和生命丧失的结束。明朝及其后继的清朝并未从战争、瘟疫和饥荒中解脱出来，但生命丧失却被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使中国人口得以从 1400 年前后的六千五百万到八千万增加到十九世纪的近四亿，以及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七亿多。

开始于十四世纪的这个时期也是一个在耕作技术和农村制度上没有明显的或引人注目的改变的时期。在整个中国农耕技术史上独一无二的，也是最重要的改变是与人们南迁到适合于种稻的地区有关的。

在前、后汉朝代中（公元前 206 年到公元 220 年），中国的人口及其农业集中于华北平原和黄河峡谷的西面，由于军事防卫原因，京城也设在那里。主要粮食作物是小米，但也种小麦、大麦和稻谷。有几个大型水利灌溉工程是由政府修建的，但粮食生产一般是用旱耕法。富人穿着丝绸，农民用粗麻纤维织成的料子做衣服，在元朝以前是不用棉花织布的，即使有，数量也不大。当时也有品种众多的蔬菜和水果，并有猪、鸡、鱼和狗等的肉类供应。

北方以小米为主要作物的旱地耕作的情景，在后汉崩溃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发生了迅速的改变。在公元第四和第五世纪，大量的中国开拓者开始移居到长江流域。最初的耕作方法是极其简陋的，与今日老挝的部分地区和越南的山地人所使用的方法有许多相似之处。土地用火烧净，然后用水浇灌，

种过以后就废弃了。

然而，随着南迁人数的增多，农业耕作就被固定下来，象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水稻也就占了统治地位。伴随水稻耕作的扩大而来的是新工具、新的轮作制以及几百种新种子的发展。把水稻移植到水田里去，需要有一种跟过去在北方干旱地上种小米和小麦根本不同的技术。

然而，早在十四世纪以前很久，稻米耕种技术的主要知识就已经出现了，并且也传播到了生长稻米的人口聚居地区。明朝建立以后的六个世纪中，农耕技术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大改进。事实上在此期间农业技术方面只有极少的改变，本书的第三、四章提供了支持这一看法的例证。

经济学家和其他一些人长期以来感兴趣的是，现代化时期以前的农村社会是如何作出经济上的决定的。有人提出，在这类社会里，生产沿着平衡状态进行，随后趋于停滞，直到新的技术发现时为止。既然没有现代的科学方法，就不大可能发明什么新的技术，那么农作物的产量长时期趋于停滞或近乎停滞的状态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对现代化时期以前的农业部门进行长时期研究，以及由实际经历来检验其生产是否停滞的国家之一。这种检验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中国有伟大历史传统。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学者和官吏一直记录着经济史研究的材料。这种材料有许多只是在分析政府制度中有用。但是那个政府按照它的职责与需要，必须对农村人口的情况知道得很多，因而这些材料中有一部分就载入了地方的和朝廷的史册。

然而，这些原始资料对于这个研究还是很不理想的。在